

許地山與香港大學

中文系的改革

〔前言〕

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行者許地山（一八九三——一九四一），一九三五年，帶着一套中國文化新概念，到了英國殖民地，緊連中國大地的南方小島——香港，以最短暫的時間，①嘗試向這裏灌注他認為此地可以接受的新思想，例如現代婚姻觀、②中國拉丁化新文字、③通識教育觀念等等，④衝擊了部分固有文化建制，引起知識分子討論，也惹來保守派的側目及不滿。可惜，這些爭論，由於他的突然去世，加上香港淪陷於日人手中，沒有延續及發展，使他帶來的衝擊，只如火光一閃，不見更佳效應。但在他繁多的工作中，⑤應以香港大學中文系的改革，最受到重視，因為時至今日，港大中文系的課程設計，仍然保留了當年改革後的大概面貌。本文試就當年資料，對改革過程作一描繪，並試反映許地山在香港的處境，他與香港大學中文系改革的關係。

〔一〕

在未呈現許地山對香港大學中文系的

改革藍圖前，我們必須理解二三十年代的香港社會文化情狀，及英國殖民地政府對大學教育的設計用心，這才能清楚理解許地山這個外來人，面對的難題，及所處的境況。

（一）早年的香港文化特質

提到早期的香港文化地位，許多人喜歡用「中西文化交匯點」，「中西文化交流中心」這些字眼。其實，深入探究二三十年代香港文化歷史的人，都了解這些詞彙並不完全切合實際情況，因為對某些階層及制度來說，的確可見交流的效果，但對整體社會文化來說，卻還有一大段差距。

英國人把某些大英帝國的文化色彩帶到殖民地來，所形成的文化圈只與「高等華人」發生關係，跟一般庶民生活無干。所謂中國學術文化，也只是極少數的傳統文化人——太史、秀才所傳播的「讀經宏道」思想，偶爾涉及書畫詩文唱酬的文雅玩意，他們就稱之為「國粹」。英國人懂華語的，例如香港總督金文泰（Sir Cecil Clement）所熱心推動的也不過是這種「國粹」，並非中國文化的精深大流。



盧瑋鑾

修葺後的許地山先生墓

而一般香港市民，如果進入正規學校或學堂的，接觸英文，以實用為目的，接觸中文，不過讀點古文經籍，這算不上文化交流。普羅大眾只求解決生活，文化認知多限於消閒作樂，更難理解何謂主流。既然學堂裏大人先生講的是四書五經，他們也就相信「讀經」是主流了。一九二七年魯迅南來，對那僵化保守勢力、英人的統治策略不滿，曾不留情面的為文鞭撻，⑥可是直到一九三五年胡適到香港來，情況仍然沒有改變，難怪有人慨歎。

「要如胡先生所期望的，把香港造成南中國文化的中心，那恐怕是不會有的事。」⑦

(二) 香港大學中文部早期面貌

英政府於一九一一年制定香港大學成立的憲章，確定大學宗旨是：

「在促進文學科學之研究，供應高深教育，……而於來學諸生，不分種族國籍，……而到友邦中華，更得深切諒解。……」⑧

成立之初，規條訂明：「本港總督及兩廣總督應被聘任為本大學之當然贊助人。」⑨學生以中國人為主，只設醫工二科。到一九一三年，才增設文科，其中「中文科」屬一年普及選修課目，由賴際熙、區大典二太史講授中文經史，⑩只是聊備一格而已。

大概太史們講的經史，在英國人眼中，雖是「中國國粹」但終非大學教育的需要，所以在一九二六年英國威靈頓代表團

(Willington Delegation) 的報告書中，就有這樣的意見：

「其中文科目，雖不宜廢止經史，但大學之中文教育，不以造就中國舊式學者為鵠的，而另有其現代意義。」⑪這意見含蓄地表示了對培養「舊式學者」的經史教學不滿，也顯露了中文科存在的問題。面臨危機，就求得變，在賴際熙奔走求援之下，得香港紳商及南洋華僑的資助，擴設中文學系的建議才獲校方通過，一九二七年中文系正式成立，教員仍是賴區二太史，只加添了一名翻譯助理講師。⑫往後幾年，儘管中文系好像擴充了，設專用圖書館，教員名額也增加了，可是先後請來的講師還是講經史的太史與秀才，實質完全無法使中文系具備「現代意義」亦即未能令英國殖民地政府滿意。所謂不滿意，一方面因為英國人心目中的「中文系」不是這個樣子，另一方面是英國人根本不重視這個系。有兩條鮮為人提及的資料，足證以上說法，現不妨引用一下。

一九三一年「中英庚款會」撥出款項二十六萬五千鎊給港大中文學院應用，但大學當局卻變更了原來用途，把這筆錢分了給其他各系。⑬而一九三二年底，「香港大學特別委員會」更建議「撤消中文科」。⑭種種表現都反映了中文系的情勢不妙。

既然在華人佔大多數的地方，一所大學無可避免要設立「中文系」，而它又必須符合英國人心目中「漢學」條件的，英國人一定要把「讀經」的模式改過來。一九三三年校長韓尼路 (Sir William Ho-

rneil) 親到北京去訪尋主持中文系的適當人選，⑮一九三四年夏天，還特別聘請了北京大學陳受頤教授、輔仁大學容肇祖教授到香港大學，提供改善中文系的方案。⑯一般說法都相信：一九三五年一月，胡適(一八九一——一九六二)到香港大學接受名譽學位時，推薦了許地山出任中文系教授，才確立了香港大學改革中文系的意念，事實卻非如此。

改革的伏線

香港大學中文系自一九二七年正式成立以後，儘管「主流」還是「讀經」，但看香港大學每年年報，都可見校方其實不斷謀求把中文系格局改過來。一九三三年「校務委員會」決定文學院增設兩組課程：〔組六〕：中文及英文，〔組七〕：中文研究 (Chinese Studies)。而教職員四名，則規定應分教：中國哲學(經籍)、中國文學、中國歷史、翻譯四科。⑰這很明顯是英國人心目中的「漢學」模式。到了一九三五年陳受頤容肇祖向港大呈交的改革中文系意見書，內容共有十點，其中第一點就清楚指出：「港大中文部應保持其原有過去之計劃，教授中國語言文字、歷史、哲學。……今後應注重用歷史與科學之見地研究經史。」⑱

據胡適的記述，他在一九三五年初來港時，已「很感覺港大當局確有改革文科中國文字教學的誠意。」⑲最重要的是他

們已開列了主其事者的應備資格：

- (一)須是一位高明的國學家，(二)須能通曉英文，能在大學會議席上為本系辯護，(三)須是一位管理才幹的人，(四)最好須是廣東籍的學者。(20)

從上述四個資格看來，港大當局考慮到學術地位能不能壓得住某些人、與上層英人能否溝通、不懂科學化業務管理、與本地人能否協調等問題。(21)其中恐怕「通曉英文」及留學英國，是他們聘請許地山的主要原因。而這個主持人來了，也必須保持及發展英人心目中的中文系「原有過去之計劃」。

這時候，正值許地山與燕京大學教務長司徒雷登 (Stuart, John Leighton) 一八七六——一九六二) 意見不合，港大向他招手，就趁機會南來，希望在英式大學裏一展所長，把新的文化觀念帶來，幫助港大中文系脫離「舊式科第文人」(22) 的手，承接中國大陸的中文教學大潮流。

改革的過程

許地山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先來港一行(23)，這一次應是就職前的見面，到九月正式上任，許氏展開的改革行動，可以說是全速前進，一切計劃獲得香港大學的校務委員會 (The Council)、教務委員會 (The Senate)、校董會 (The Court) 順利通過，(24)且在報紙上作了一系列報導。這些速度和姿態，是值得我們注意的。一九三五年九月初，許地山就職後就向報界宣稱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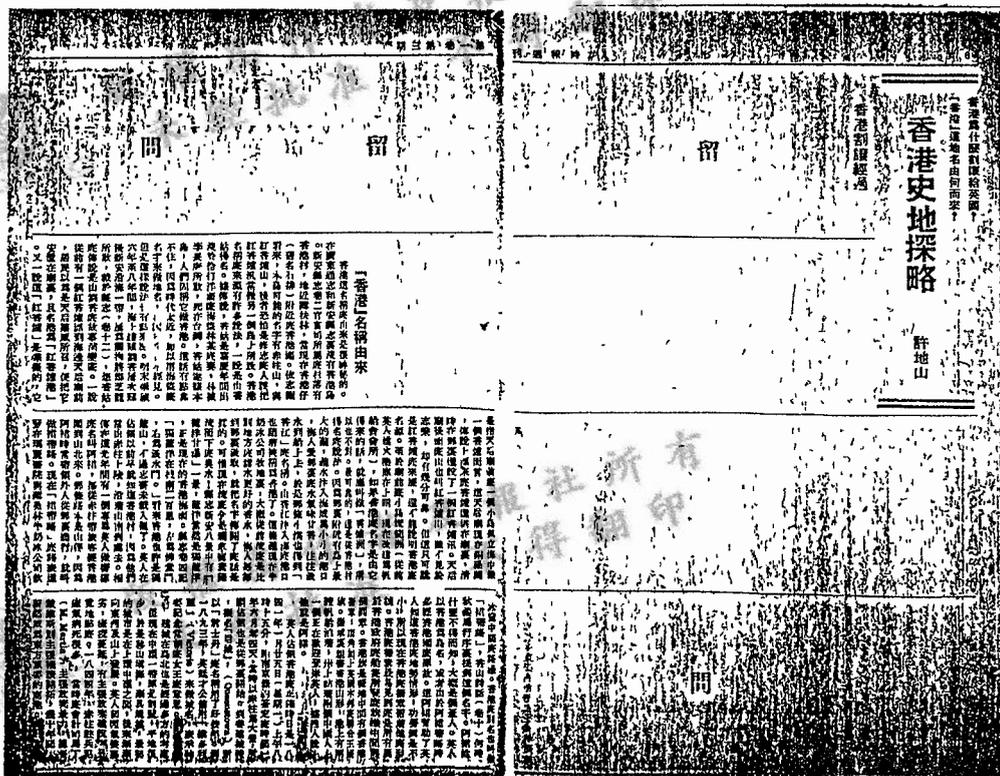
「擬將港大之漢文學院改為中國文史學系，蓋文學與史學有連帶之關係，今將之拼成爲一學系，固得其宜，在名義上亦較爲妥當。」(25)

到了十月，許氏答覆記者訪問時，就說把「中文部」改爲「中國文學系」的改組計劃書已經交給港大校長韓尼路察核，(26)以後一連數天，報上刊了相當詳細的改組計劃內容及許氏的意見，其中強調了「係依據許地山碩士之獻議及陳容兩教授之意見」，及文學、歷史、哲學的分科。(27)

當時在中文部主任教的有：區大典太史、羅芾棠舉人、崔百越秀才、陳君葆。報上說各人均於學期末任期屆滿，但據資料顯示，區大典是退休，羅崔二人，卻是港大教務委員會建議：「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不再續聘」的，(28)也就是表示一九三五年底，已把「讀經」派全部剔除，一九三六年三月，聘任馬鑑 (一八八三——一九五九) 爲該全職講師，則整套改革計劃大功告成，從此，香港大學中文系包括了文、史、哲、翻譯四項課程，也成定局了。(29)

這項改革，在開始一兩年，許地山和港大當局都很滿意。許氏在港大五年年報中，對一九三七年的工作有這樣的描述：「該年有一個突出的現象，學生對中文科的興趣顯著增加，他們不再以爲研究中國文學是自己力有不逮的事情。他們的語文程度比以往同學更高，也明顯可見他們的閱讀範圍迅速擴展。」(30)

而港大「特別委員會」的報告中，也對中



〈時報周刊〉一卷三期

1941. 3. 29

圖片說明：

許地山寫的香港史，部分被禁。

香港三十年代的〈印刷業及出版業條例〉規定大小報刊排好後均須送「華民政務署」檢查。如有問題，即被「抽檢」或「留問」。報刊上就開了天窗。

- 六年九月二十六日，二張五頁）均見他提出的「現代婚姻」觀，例如「男女結婚不應只用精神來維持，……結婚以多情為基礎是危險的事情。」「結婚有社會意義，……乃是建設社會，使女子從廚房解放出來……」這都是使保守人士訝異的看法。
- ③ 許地山在香港推動新文字不遺餘力，除組成「香港新文字學會」外，更執筆寫了拉丁拼音作品《NOUDAE》，這是他為《新文字五分鐘讀物》寫的，見《香港新文字學會會報》第一號，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。
- ④ 《港大教授許地山在華僑教育會演講》，《工商日報》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三張一頁。
- ⑤ 許地山七年工作，見盧璋鑾編《許地山在香港活動紀程》《八方》第五輯，一九八七年四月，頁二七一至二九三。
- ⑥ 魯迅《略談香港》《語絲》一四四期，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，後收入《魯迅全集》三卷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，一九八一年出版。
- ⑦ 鄭德能《胡適之先生南來與香港文學》《香港華南中學校刊》創刊號，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，收入盧璋鑾編《香港的憂鬱》，華風書局出版，一九八三年十二月，頁六十九至七十四。
- ⑧ 據胡適《南遊雜憶》（《獨立評論》一四一期，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，收入《香港的憂鬱》，頁五十五至六十一）原文應為：「使香港成為南方的一個新文化中心。」
- ⑨ 轉引自羅香林《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》，中國學社出版，一九六一年二月；頁二二八。
- ⑩ 轉引自《許地山教授談香港大學的條件》
- ，《大眾日報》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，二張五頁。
- ⑪ 羅香林《香港大學中文系之發展》，《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》，中國學社出版，一九六一年二月，頁二二三至二五六。
- ⑫ 《一九二六年香港大學特別委員會關於中文教育之報告》（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appointed to advise the Teaching of Chinese, 1926）轉引自羅香林《香港大學中文系之發展》。
- ⑬ 同⑩。
- ⑭ 《香港大學巡禮——許地山博士之上下古今談》，《大眾日報》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，二張五版。
- ⑮ The U. of H. K. Annual Report 1932—1933，頁二十一。
- ⑯ 同⑭。
- ⑰ The U. of H. K. Annual Report 1934—1938，頁四十四至四十五。
- ⑱ 胡適《南遊雜憶》也提及此事。
- ⑲ 同⑭。
- ⑳ 《香港大學改組中文部 昨日下午再正式召開會議》，《工商日報》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六日，三張二版。
- ㉑ 胡適《南遊雜憶》。
- ㉒ 同⑲。
- ㉓ 許地山祖先是「從廣東揭陽移到台南」，故有些學者把他列入廣東籍，例如宋聘莘《廣東人物小傳》，台灣（作者自費出版），一九八〇年四月。
- ㉔ 同⑲。
- ㉕ 周俟松（許地山夫人）給作者的信。
- ㉖ 見《香港大學校務會議紀錄》各檔案。
- ㉗ 《港大漢文學院或將改為中國文史系，許地山教授就職後將有新猷》，《工商日報》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，三張一版。
- ㉘ 《許地山獻議改組港大中文部 計劃書已呈副校長察核》，《工商日報》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日，三張一版。
- ㉙ 《香港大學今晨開會討論改組中文部事獻議人許地山教授亦出席會議》，《工商日報》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四日，三張一版。
- ㉚ 《香港大學改組中文部 昨日下午再正式召開會議》，《工商日報》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六日，三張二版。
- ㉛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《港大校務會議紀錄》。
- ㉜ 有些研究者或為許地山寫傳記的人，都誤把許地山「改革中文系」，說成「改革文學院」。說「把文學院分成文學、史學、哲學三個系」，這種錯誤說法，大概由於誤解了《許地山先生生平事略》及馬鑑《許地山先生對香港教育之貢獻》二文所載意思，也可能不清楚原始資料，而加推想而成。（二文均見盧璋鑾編《許地山卷》，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，一九九〇年三月出版）
- ㉝ 同⑱。
- ㉞ 《港大特別委員會編造報告條陳改革方案》，《工商日報》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，三張三版。
- ㉟ 《各方主張港大中文學院收中文中學畢業生》，《華字日報》，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，二張三頁。
- ㊱ 《中英文化合作，許地山之意見》，《華字日報》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，二張三頁。
- ㊲ The U. of H. K. Annual Report 1939—1940，頁八。有關中文系部分只說：「選修各課程的學生人數大致一樣。除堂課外，編排一基本梵文課程。」
- ㊳ 師山《香港大學故教授許地山》，《星島晚報》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。
- 文中引述「地山高足金君」的說話。